

● 政治学

外交政策研究的学科跨越^{*}

——从政治文化研究外交政策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汪 波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汪 波(1955-),男,安徽郎溪人,武汉大学法学院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国际政治理论研究。

[摘 要]通过政治文化研究外交政策,主要是从民族国家的价值观念和信念体系来分析表现为国家对外行为方式的外交政策的根本动机和实现途径,这将有助于从国家这个有机体的性格特征来解释外交政策所包含的本质特点和发展趋势。因此,在理论意义上,这种研究方式为外交政策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现实意义上,这种研究可以从更加深入的层面来理解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中文化民族冲突日益加剧的原因。

[关键词]政治文化;外交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 D 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0)01-0078-05

通过政治文化研究外交政策的构想,是伴随着本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脉络和国际政治局势变化的现实而提出的。冷战结束以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使得各国经济形式的差异在国际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不断减少,国家之间的经济界线也在变得日益模糊。与此同时,随着世界民主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国家之间的政治形式也在逐步接近,建立国际经济和政治新秩序的构想已成为国际政治理论中越来越广泛的话题。然而,一体化的趋势并未消除国际社会中的冲突,因为很多地区性冲突的根源主要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与各种实际利益交织在一起的文化和民族矛盾。在国际政治局势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化面前,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国际政治在即将来临的新世纪中面临的另一重大问题将是文化民族主义对国际政治关系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因为在国际经济和政治走向一体化的过程中,国家之间的本质区别将更多地表现在文化特征上。构成国家政治文化基础的民族自我意识和价值观念差异,将会通过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充分展现出来。通过政

治文化研究外交政策的方法正是为了适应国际政治这种新的发展,试图在外交政策理论研究中提出一种新的视角,从政治文化与外交政策的特殊关系中把握国家外交政策制定的依据和发展逻辑。

一、这种研究方法构思的依据

构思通过政治文化来分析外交政策的研究方法的依据,首先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就是在国际政治体系中,作为主要行为主体的国家有机体的对外行为方式,必然要受到国家性格的影响,并在对外政策中表现出各自的个性特点。这种把国家看做有机体的观点具有深远的历史来源和理论依据。黑格尔曾深刻分析过民族有机体的性质。马克思也明确指出:“马基雅弗利、康帕内拉和今后的霍布斯、斯宾诺莎、胡果、格劳修斯,以及卢梭、黑格尔等,都已经用人的观点来看待国家了。他们是从理性和经验中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1](第 128 页)根据这种“人”的观点,国家这个抽象实体自然具有某种性格或个性特点,而且会表现在代表其对外行为方式的外交政策

之中,这就是通过政治文化分析国家外交政策的依据。从现实的政治生活来看,国家外交政策的制订和外交目标的实现,首先就是一个政治过程。因为外交政策追求的目标不仅涉及国家的物质和精神利益,而且还要在外交政策目标的确定和外交政策目标实现的过程中,体现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所决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原则。因而,要从整体上把握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内涵,就必须把政治过程和文化背景两者结合起来考察,也就是研究一个国家政治文化取向如何在外交政策中体现。所以,从研究方法的意义来说,通过政治文化来分析国家外交政策的研究方法,正是建立在政治文化和外交政策这种特定关系的前提之上。

本文构思从政治文化研究外交政策的另一个重要依据,是当前外交政策研究中与此有关的研究已经取得的进展。在国际政治学界,把政治文化和外交政策联系起来考察,目前已经开始受到国内外学者一定程度的重视。特别是在美国学者中,近年来他们对外交政策的研究,已经对政治文化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关注。根据美国学者近年来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以及与美国学者的直接访谈和信件交流所了解的情况,美国现在已经有一批学者正在从事把政治文化与外交政策结合起来的有关研究。总的来说,他们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把外交政策和政治文化中某个方面相联系,从这个特殊的角度对外交政策进行研究;另一类则是以公众舆论对外交政策的反应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公众舆论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及其影响方式,运用科学行为主义的方法,通过大规模的实地调查,用问卷式的统计方法来研究公众舆论对外交政策的態度。

具体来说,美国学者的成果中属于第一类的研究主要有:(1)文化的角度,主要作品有哈德逊(Valerie Hudson)的《文化与外交政策》(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2)美国理想和使命的角度,主要作品有波恩斯(Edward Burns)《美国的理想:国家目标和命运中的使命概念》(The American Idea of Mission Concepts of National Purpose and Destiny);(3)种族的角度,主要作品有:沃尔克(R. B. Walker)《种族、冲突和国际秩序》(Race, Conflict and International Order);(4)道德与伦理的角度,主要作品有:维吉尔(George Weigel)《威尔逊精神的实践:美国第三个世纪的道德与外交政策》(Exercising Wilson's Ghost --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in America's Third Century);汤普逊(Kenneth Thompson)《道德与外交政策》(Moral

ity and Foreign Policy);迈克罗伊(Robert McElroy)《道德与美国的外交政策:伦理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Moralit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Role of Ethic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5)决策者个性的角度,主要作品有:赫尔曼(Margaret Hermann)《个性与外交决策:对 53 位政府首脑的研究》(Person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A Study of 53 Heads of Government);(6)法律和秩序的角度,主要作品有:班克(Charles Banker)《权力和法律: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两难处境》(Power and Law: American Dilemma in World Affairs);(7)哲学的角度,主要作品有:格莱塞(Kurt Glaser)《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哲学》(American Philosophy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8)人性的角度,主要作品有布隆菲尔德(Lincoln Bloomfield)《美国外交政策的探索:权力的人性使用》(The Search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Humane Use of Power)。

研究成果属于第二类的主要是美国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调查活动,其中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两个小组:一个由赫尔斯第(Ole Holsti)和罗塞纳(James Rosenau)所领导,另一个在佛罗里达大学威特考普夫(Eugene Wittkopf)指导下工作。他们广泛收集美国政府领导人和公众的共同信念,把调查数据归纳整理后储存在芝加哥的资料中心,以此为根据来研究这些信念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另外,俄亥俄州立大学国际研究中心的赫尔曼(Robert Herrmann)教授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也曾经在 1996-1997 年间对美国公众开展过一次广泛的调查,了解他们对国家外交政策、军事问题、对外经济关系的看法。

从研究的整体性来看,美国学者把政治文化与外交政策联系起来所作的研究大多是零散、局部、表面和现象的,并不是从政治文化的整体性来分析它所决定的外交政策的本质特点。但是,美国学者的研究,却为本文构思的研究方法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依据。因为政治文化的特点就是对多种学科进行综合,通过政治文化来研究外交政策,就是把政治、哲学、历史、宗教、文化、伦理等学科之间的知识联系起来,运用相互渗透的知识体系来分析外交政策的本质特征,从而形成这种研究方法的一个根本特点。本文所构想的研究方法就是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从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和信念体系出发,来研究它们对外交政策在一定条件下所起的主导作用。这种创新的构想,目前国内外学术界虽然尚无先例,但这种研究方法所涉及的很多具体有关问题,已经为这种研究方法的构想奠定了基础。

另外,为了建立从政治文化研究外交政策的研究方法,政治文化理论本身,特别是它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所取得的成果也是一个重要依据。对政治文化的研究开始于半个世纪之前,大致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第一阶段是 30 年代西方政治学界在人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新学科冲击下出现的政治行为革命基础上,对政治文化现象的关注。第二阶段是 50 年代,阿尔蒙德综合人类学有关文化研究、社会学有关社会化和小团体研究以及心理学有关个人性格研究等方面的新成果,提出政治文化概念,以及 1966 年他在《比较政治学》一书中对政治文化概念的定义,即“一国居民中当时盛行的态度、信仰、价值观和技能。”^[2](第 153 页)第三阶段是 80 年代末,鲁西安·派伊(Lucian Pye)和谢德尼·韦伯(Sidney Verba)合作编写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论文集中 8 篇有关政治文化的论文,对近年来有关政治文化理论研究主要成果作了总结,并奠定了政治文化理论研究的基础。对于政治文化的根本特性,派伊指出:“政治文化能够在特定的政治领域中建立结构体系和明确意义,就像文化可以用同样的方式,为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生活建立一致性和整体性。”^[3](第 8 页)而建立政治文化的目的,则是“为了在政治学关于行为方式的研究中,弥合建立在针对个人政治行为方式的心理学解释基础上的微观分析和建立在政治社会学所熟知的各种可变现象基础上的宏观分析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3](第 8 页)

关于政治文化理论的研究,西方学者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不足之处在于,西方学者在研究政治文化的时候,往往只强调用整体的观点来看待个体的行为方式,而没有注意到个体与社会整体之间相互关系的意义。为了建立从政治文化研究外交政策的方法,本文认为,应该在西方学者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著名观点,来深化对政治文化含义的理解。因为政治文化研究的对象,是具体社会体系中以人为核心的政治关系的文化特征,其价值在于把涉及人与人关系中范围最广泛的文化和代表社会权力关系的政治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从而确定以国家为单位的、社会整体的价值观念、信仰体系和情感倾向的形成根据及其对政治行为方式的影响。所以,其含义是指推动民族国家政治体系运动的核心因素和凝聚力量,并具体表现为民族传统文化中那些融会在政治体系运行过程中的道德原则、价值观念、利益标准和期待目标。从

发展的观点来看,虽然政治文化所代表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准则会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革中有所改变,但却无法失去它所具有的不同民族的文化特点。根据政治文化的这种特点,它在外交政策理论研究中的价值,就是提供一种从国家个性特征的角度来认识具体国家外交政策性质的途径,并以此为根据来把握各国外交政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规律。

二、这种研究方法的理论价值

在当前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中,通过政治文化研究外交政策在理论和现实两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研究方法来说,通过政治文化来研究外交政策,主要是一种研究角度的创新,它强调的是上层建筑中不同因素之间的作用。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肯定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之后,同样也要重视上层建筑对社会生活的指导作用。对此,恩格斯在解释上层建筑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时曾经指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从来都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惟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是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形式和这个斗争的结果……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所有这些都对历史上斗争的发展施加影响并在很多情况下决定了斗争的形式。”^[4](第 477 页)通过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政治文化来分析国家的外交政策,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原理,其目的是为了把握国家外交政策与国家基本特征之间的关系,从而为了解外交政策的实质和发展趋势提供合理的依据。

作为外交政策理论在研究方法上的一种创新,通过政治文化研究外交政策的研究方法在理论上至少有两方面的价值:其一,本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经历了理想主义、现实主义、科学行为主义与后行为主义的发展。1980 年以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中,国际政治曾一度特别强调国际经济政治化的研究。进入 90 年代以来,随着苏联和东欧的巨变与国际社会冲突中民族和文化因素表现得日益明显,国际政治学界也越来越重视从历史文化、意识形态、民族特性、国家性格等角度来研究国际政治。亨廷顿有关文明冲突的理论,就代表了这种理论研究的发展

趋势。本文也是基于这种趋势的影响,其目的是要运用具有综合性质的政治文化研究方法来建立研究外交政策的新途径。在国外,美国学者虽然在研究外交政策时已经开始关注政治文化,但重点主要是运用数量统计的行为主义方法来研究公众舆论与外交政策的关系。本文强调的侧重面不同于国外学者所做的现象研究,而是用政治文化理论建立的方法,从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所产生的影响来研究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主导作用。

其二,目前,国际政治学界对外交政策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强调外交政策中包含的政治和经济动机,在分析方法上也往往局限于政治体制和决策程序等个别和表面现象,未能深入探讨外交政策中包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内在整体联系,并以此作为研究外交政策必然发展趋势的依据。其实,外交政策作为国内政治的继续,在反映国家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同时,也是国家政治文化最充分和具体的表现。黑格尔以“有机体”的观点对国家性质所作的解释表明,国家在对外交往方式中不但包含有政治和经济的动机,同时也包含着决定这个有机体个性特征的政治文化因素。所以,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外交政策进行立体的、多层次的分析,将有助于透视外交政策产生的深刻背景和外交政策的内在发展规律,把握不同国家外交政策的发展轨迹和逻辑趋势,为分析各国的外交政策提供合理的解释和根据。

三、这种研究方法的现实意义

通过政治文化研究外交政策,主要是强调从国家性格出发来分析其对外行为方式,以说明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实际影响,因而同样也具有现实意义。关于政治文化研究方法的现实意义,美国政治学家韦伯在“比较政治文化”一文中指出,政治文化理论的研究方法,首先是把人的主观意识和政治事件结合起来考察,也就是把重大政治事件与个人对这些事件作出反应的行为方式联系起来。同时,政治文化的研究方法也强调,应该把政治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观察。长期以来,政治学研究者往往特别重视对政治体系中大量的个别方面进行深入分析,而政治文化的研究方法则使政治学家开始把注意力转向所谓的政治的“基础本质”问题。这种研究方法把作为国家的政治系统的政治信念看做一个整体,以国家的政治态度作为研究对象。由于这种观点把代表国家的政治体系内的所有成员看做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政治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国家文化”^[3](第513、520页)。韦伯有关政治

文化研究方法的论述,所强调的就是政治文化从民族国家的整体性特点来观察国家行为方式的现实作用,从而为了解代表国家对外行为方式的外交政策的本质属性建立了一条直接的途径。

从外交政策研究的现实意义来说,本文构思通过政治文化分析外交政策的研究方法的根本目的,是要尝试建立一种新的外交政策研究模式,以分析政治文化对于某一政治体系在决定其对外交往中所持态度和目标时发挥的重要作用。对于政治文化的这种作用,韦伯认为,既然“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一般由经验主义的信条、具有表达意义的象征物、以及决定政治行动产生的环境的价值观念所形成的体系组成,这就意味着政治文化在政治体系中提供了一种主观的倾向性。”^[3](第516页)目前,在外交政策研究中,研究者只能把注意力集中于其中的某个方面。而政治文化不仅是政治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一个方面,而且政治文化包含了政治体系中各个方面正式或非正式的错综复杂的联系,这就为研究外交政策提供了具有现实意义的整体观念。

在现实的外交政策研究中,体现研究方法实用意义的最好方式,就是能够把抽象的理论与对具体国家外交政策的分析结合起来。从政治文化分析外交政策所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价值。以当今世界上影响最广的美国外交政策作为研究,就可以具体了解这种研究方法的特点和意义。多年来,虽然研究者曾经通过决策程序、政治机构、压力集团和公众舆论等不同角度进行分析,但这些角度显然尚未完全触及美国外交政策的本质特征。通过政治文化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分析,我们就会发现,美国作为一个移民社会,其历史传统和文化特点集中体现在它的政治文化中。对于美国社会的这种特点,马克思曾经指出:“在那些已经发达的历史时代才开始自己发展的国家里,例如北美,这种发展是异常迅猛的。在这些国家里除了移居到那里去的个人而外,没有任何自发地形成的前提。而这些个人之所以移居到那里去,是因为他们的需要与古老国家里现存的交往形式不相适应。因此这些国家在开始发展的时候就拥有古老国家的最进步的个人,因而也就拥有与这些个人相适应的,在古老国家里没有确立起来的最发达的交往形式。”^[5](第80页)正因为美国社会这种非同寻常的建立过程,政治文化自然会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尤其突出的影响。实际上,在美国外交政策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中,如果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进行观察,就不难发现,美国的外交政策在经济实力决定其总体规模的前提下,政治文化不仅对外交政策发

挥了主导性的影响作用,而且还提供了合理的价值解释和道德依据。美国建立之初,在其经济实力不足以问鼎世界霸主的一个多世纪中,美国政治文化中自我标榜的“选民”观念和对外部世界彻底否定的排外情绪,曾经为孤立主义外交思想的产生提供了认识前提,并成功地维护了美国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外部环境。二战以后,随着美国经济实力世界领先地位的形成,美国政治文化中自诩的“弥赛亚主义”的“使命”意识,又为带有强烈干涉色彩的全球主义外交政策奠定了道德基础,并为美国在全球推行的霸权主义外交政策从信念上提供了合法依据。因而,从政治文化角度分析美国外交政策,最现实的意义就是能够说明美国外交政策目标建立的连续性动机,并为其发展趋势提供合理解释。

总之,建立从政治文化角度分析外交政策研究方法的目的,是为了在即将来临的新世纪中,为外交政策的研究提供一条新的思路。这种研究方法的建构,首先是为了适应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发展的趋向。因为在经历了后行为主义强调的对经济政治化问题的广泛重视之后,国际政治理论已经对民族文化主

义表现出日益强烈的兴趣。同时,这种研究方法所运用的政治文化理论也是一个最近倍受重视的热门课题。虽然学术界对政治文化的研究还不完全成熟,但政治文化所反映的民族国家整体性格特征,已经为研究具体国家的外交政策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参 考 文 献

- [1]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2] [美]G° A° 阿尔蒙德,小 G° B° 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 [3] PYE L, VERBA S.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 [4]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5]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 叶娟丽)

Research on Foreign Policy Theory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WANG Bo

(Wuhan University Law School,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WANG Bo (1955-), male, Doctor, Associate professor, Wuhan University Law School, major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bstract The method of the research on foreign policy through political culture is to analyze the intrinsic intensity of foreign policy and the impact of the value concept and belief system of a nation state on the way of realizing the foreign policy. This research method will provide a new angle for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 It will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reasons that lead to the more and more serious conflicts between cultures and nations from a deeper level.

Key words political culture; foreign policy; research